

85.1

丛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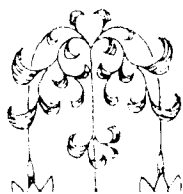
中國現代文學研究

中國現代文學研究

丛刊

11

1985



作家出版社

封面题字：启 功

封面设计：宋世伟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一九八五年 第一期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 台编
中国现代文学馆

*

作家出版社出版

(北京沙滩北街2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一二〇二工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0印张 250,000字
1985年1月第1版 1985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0

书号：10248·005 定价：1.25元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 丛刊

1985年第1期（总第22期）

目 录

· 论 坛 ·

在广泛的世界性联系中开辟民族文学发展的

新道路 王富仁 (1)

短 论

由现代文学博士研究生试题想起的事 ... 唐 弢 (26)

从现代文学看当代文学的两点思考 洁 汎 (36)

中国现代作家作品论的基本原则 李何林 (41)

如何更好地发挥文学的社会作用 钱谷融 (45)

如何开创中国现代文学研究 和教学的新局面（之五）

关于开创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新局面的几点想法 ... 樊 骏 (50)

关于建立中国现代文学“史科学”的建议 马良春 (75)

在教学中培养学生创造能力 苏州大学中文系
现代文学教研室 (84)

· 作家作品研究 ·

说《离婚》 吴组缃 (93)

论沈从文的湘西小说 赵福生 (114)

·纪念“左联”成立五十五周年·

笔 谈	关于左联研究的意见	丁景唐 (124)
	纪念左联 研究左联	陈瘦竹 (128)
	开拓者的功绩不应抹煞	叶子铭 (130)
	要重视左翼时期的理论成果	杨占升 (132)
	尚待研究的课题	张大明 (135)
论左翼创作理论对三十年代文学的影响		胡有清 (138)

·青年论丛·

二十世纪初叶四川社会的人间喜剧

——论李劫人的三部曲	张颐武 (154)
试论巴金中篇小说中的软弱者形象	李 今 (172)

·争鸣园地·

《文博士·序》非老舍作品	史承钧 (189)
早期的闻一多与唯美主义理论	
——《闻一多早期唯美主义述评》质疑	魏蒿年 (193)
也谈《故乡》的主题思想	
——对一个老题目的认识	周 音 (204)
虎妞形象再议	王静波 (213)

·资 料·

茅盾同志书信六则	(218)
----------------	-------

茅盾五十寿辰作家题词、贺信选	(226)
北京大学1984年中国现代文学博士研究生专业试题	(237)
华东师大1984年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入学试题	(237)

· 书 话 ·

《读书三昧》及其它	姜德明 (239)
《抗战独幕剧选》和田汉的序	吴泰昌 (244)

· 书 评 ·

读《鲁迅前期小说与俄罗斯文学》	刘 纳 (247)
一本有特色的现代文学论文集——读《求实集》	朱晓进 (253)

· 当代作家谈现代文学 ·

在现代文学的摇篮里长大	聂鑫森 (259)
新的天地	赵本夫 (260)
走过这座桥	唐 栋 (262)

· 现代文学研究在国外 ·

我在美国所见	乐黛云 (264)
近年来美国的《中国现代文学通讯》	陈圣生 (275)
赵树理作品在日本	〔日〕林千野 (285)

· 论 文 摘 编 ·

鲁迅、周作人文学观发展道路比较研究（钱理群，293）	论丁玲
----------------------------	-----

早期创作的艺术倾向(郭成,294) 我所理解的“乡土文学”(蹇先艾,296) 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的文学主张再认识(陈慧忠,297)

· 动 态 ·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第三次年会在哈尔滨召开(辛,298) 《中国新文学大系(1927—1937)》已分卷出书(尚艺,300) 陈涌谈鲁迅研究(王绥,110) 江苏省召开第二届瞿秋白研究讨论会(徐瑞岳,301) 苏州大学摄制鲁迅研究电视资料片(思言,91) 山东省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召开第二次理事会(朱德发,303) 王瑤赴日讲学(冰,304) 《小说鉴赏文库》现代卷即将出版(秦宪文,305) 《延安文艺研究》创刊(宪,153) 《走向世界文学——中国现代作家与外国文学》一书将问世(肖晓,258)

改版致读者 (306)

在广泛的世界性联系中 开辟民族文学发展的新道路

王 富 仁

德国诗人歌德曾经提出过一个“世界文学”的概念，马克思和恩格斯接受了这个概念，并对之做了深刻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说明。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共产党宣言》中，他们都曾指出，现代的工业大生产必然地、毫无疑义地要冲破世界各个民族在封建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狭隘民族界限，“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愈来愈扩大，各民族的原始闭关自守状态则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此自发地发展起来的各民族之间的分工而消灭得愈来愈彻底，历史就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①“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②也就是说，在现代社会生产的条件下，一个民族的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再也不是也不可能是在纯

① 《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1页。

② 《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5页。

粹民族的规模上进行的了，现代世界各民族建立起来的广泛联系，使每个民族都有可能更为充分地利用全人类所创造的物质或精神的丰富成果，也只有那些能够最大限度地利用这种成果做为发展本民族的物质生产或精神生产的民族，才有可能把民族的物质生产或精神生产提高到现代世界的新水平，也才有可能保证本民族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独立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一科学论断，对于我们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人来说特别重要。它告诉我们，建立和发展本民族与世界各民族文学的广泛的、紧密的世界联系，是整个世界的现代文学的根本方向，是它的一个本质特征，这不是由某一些人的主观愿望所决定的，而是一个不依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它是由现代物质生产方式所规定的精神生产方式。

假若说在广泛的世界联系中发展独立的民族文学是现代各民族文学必具的共同特征的话，那么，它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建立和发展则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世界文学史上的文学革新运动，无非有下列四种革新途径：一、以复兴古代文学的旗帜为号召实现对当代文学的革新；二、引进清新的民间文学新风，革除文人文学的颓靡文风；三、以新的哲学、美学学说，自创新的文学原则；四、借异域文学的榜样，实现对本民族文学传统的革新。在中国现代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最后一条道路是最为有效的实际途径。我们知道，中国封建的闭关锁国的状态不是由本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自身发展撑破的，而是被外国资本主义生产的冲击波由外而内地冲破的。在那时，中国还保留着完整的封建社会形态，资本主义工商业只有一些微弱的萌芽，资产阶级民主思想还没有构成完整的理论学说。在漫长的封建历史上，中国人民创造了为西欧中世纪文化所无法比拟的丰富灿烂的文化，但它却不能不是在封建时代发展起来的属于封建文化范畴的东西，其中那些民主性的精华在当时还裹挟在它的大量的封建性尘垢中，没有来

得及站在彻底反封建的立场上进行必要的清理。在农业自然经济的基础上产生的民间文学，尽管保留着它一贯的清新、朴野的特点，但也并非与封建文化完全异质的东西。而在西方，却早已进入了资本主义时代，从文艺复兴到那时的几百年间，不但资产阶级思想学说得到了充分发展，资产阶级文学有了空前繁荣的发展，而且在稍后一个时候还产生了无产阶级的思想学说——马克思主义，产生了早期的无产阶级文学。我们不难看到，尽管在外国文化和外国文学中也有精华和糟粕，但做为一个整体，它却是与封建文化异质的东西，是可以被中国新文化的倡导者直接利用的东西。在这种历史条件下，正象我们不必再重新发现牛顿三定律，不必再重新发明电灯、电话，中国新文化的建设者们也没有必要从头摸索，重新建立反封建思想的理论学说和文学学说，他们的任务是直接利用外国文化以实现对对中国封建文化的革新，并在具体的革新实践中将外国文化过滤、筛选并使之民族化。这也就意味着外国文学的影响在整个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和发展中所发挥的作用就整体、就主流、就本质而言是相当重要的，是有利于而不是不利于、是推动了而不是阻碍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健康发展。我认为，我们必须注意这个基本估计，坚持这个基本估计，任何否认这个基本估计的论点都会走向对中国现代文学自身的否定。

下面，我们简略地考察一下外国文化、外国文学的影响在中国现代文学发生和发展的各个历史时期的表现，并附带谈一谈我对一些有关问题的看法。

一、中国现代文学的史前期

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到1917年新文化运动的发生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史前期，亦即它在封建文化的母腹中开始成型的孕育期。

在这个时期，中国封建闭关锁国的状态开始被打破了，中华民族与世界各民族的广泛世界联系初步建立了起来。马克思说：“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在英国的努力之下被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木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①正是因为如此，当时新与旧、今与古、新生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与腐朽的封建传统思想、新的文学观念同封建的文学观念才不能不具体转化为“外”与“中”的斗争。是扩大、发展同世界各民族的文化联系，还是缩小、抑制这种联系的建立，是当时先进思想家与封建守旧派斗争的主要表现形式。那些提倡经济、政治、文化改革的先进思想家，几乎毫无例外地是注意并提倡向外国学习的人士，是有着更多的世界文化知识的有识之士。在逐渐建立的世界联系中，外国的思想文化学说被介绍了进来，外国文学作品的译本逐渐增多，各种文学样式的地位按照西方的文学观念得到了初步的调整，小说和戏剧的地位得到了提高，小说创作的数量急速增加，各种报刊杂志大量涌现出来。外国文化逐步扩大的影响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生准备了必要的条件。对于这一个时期的文学历史，我们没有多大的分歧意见，对当时先进思想家向西方寻找真理的行动也不存在任何的异议，但我认为有一点应当值得我们注意，亦即它为什么仍然没有催生出崭新的中国新文学？为什么仍然没有拉开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幕布？很显然，这个时期的先进思想家对中国封建传统的否定还是零碎的、片断的、不全面和不彻底的，对外国文化的肯定还是有保留的、片断的、畏葸的和无力的。那时一方面用外国文化改造着中国封建文化，但同时更多地则是使外国文化接受中国封建文化的改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还占着统治地位，

① 《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页。

在文学上，林紓对外国小说的翻译仍然用中国传统小说的结构样式改造着外国小说的结构样式。由此可以看出，当对中国封建文化传统的整体性否定形式和对外国文化的整体性肯定形式还没有达到一定的强度时，中国现代文学的革新仍然无法得到实现，中国现代文学仍然无法从中国古典文学的母腹中被催生出来。这里不是一个理论口号是否完整准确的问题，而是一个革新者在当时如何才能有效地打破文化排外主义，建立与世界文化的更广泛的联系，实现中国现代文学革新的问题。了解这一点是十分重要的，它可以帮助我们更精确地分析“五四”新文化建设者们的历史功过。

二、中国现代文学的第一个十年

“五四”新文化运动正式揭开了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第一页，它结束了历经数千年的中国封建文化、封建文学史，为此后中国文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而这个文化革新和文学革新的运动，是以输入、介绍、借鉴外国文化、外国文学的形式实现的，外国文化和外国文学的影响在这个运动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但是，恰恰在评价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对外国文化的态度上，自三、四十年代至今都有些歧异。我认为有必要提出来讨论。

任何一个实际的运动，都是纷纭复杂的，都可能从左右两个方向上溢出正常的运动轨道，文学史家的任务在于从本质上、从基本倾向上判定它的成功和失败、经验和教训。“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缺点是否是“全盘西化”和“兼收并蓄”呢？我认为不是。在理论口号上，在论述形式上，我们并不难找到这样的例证。但重要的是实质，而不是口号。首先我们注意到，鲁迅当时的一些理论表述就表现出了“全盘西化”或“兼收并蓄”的倾向。他说：“即使所崇拜的仍然是新偶像，也总比中国陈旧的好。

与其崇拜孔丘关羽，还不如崇拜达尔文易卜生；与其牺牲于瘟将军五道神，还不如牺牲于Apollo。”^①他还说：

中国书虽有劝人入世的话，也多是僵尸的乐观；外国书即使是颓唐和厌世的，但却是活人的颓唐和厌世。

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②

当然，鲁迅的话也不是金科玉律。但我们却必须注意到，在理论形式上这样进行号召的鲁迅，却恰恰是中国现代最伟大的民族文学的创建者，是现代中华民族的最杰出的代表之一，而那些对中国传统文化持有“公论”的“国粹家”，却没有为中华民族的文学事业做出任何贡献，成了中华民族的文化罪人。这里的关键何在呢？任何一个革新家，都不是唱着赞美歌对他的革新对象实行革新的，高张否定的旗帜，在否定中求肯定，在扬弃时有保留，在革除中有继承，是其主要理论行动路线；同样，任何一个革新家，都不是高声诅咒着他的革新武器而进行使用的，高张肯定的旗帜，在肯定中有否定，在使用时有选择，在继承中有扬弃，是其主要理论行动路线。不用这个路线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我们很容易造成当时革新者的言论是偏颇的、而反改革者的言论倒是几近正确的印象，或者认为两者各有偏颇，“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种错误倾向反对另一种错误倾向的斗争。

用以上的标准返观“五四”新文化运动建设者们对外国文化和外国文学的态度，我们便会发现他们从总体倾向上不是、也不会是“兼收并蓄”的。因为他们要反封建，他们要的是与反封建有关的东西，其余的东西他们不愿接受也来不及接受。我们看到，西方近现代几乎所有文学潮流都能在“五四”新文学运动的

① 《坟·随感录四十六》。

② 《华盖集·青年必读书》。

革新者中找到自己的同调者，但唯独古典主义和西方中世纪文学却没有一个当时的文学革新者对之激赏。西方浪漫主义文学运动的一个重要口号是回到中世纪去，西方象征主义者也把中世纪宗教象征主义奉为自己的楷模，但中国的浪漫主义者和象征主义者却对此没有多大的兴趣，西方中世纪文学在“五四”新文学运动中没有得到相应的呼应。其原因是明显的，以反封建为己任的新文化运动的参加者和新文学作家，是不会重新把西方封建文化和封建文学做为自己效法的模范的。而其余一些文学潮流，不论其高下有何差别，但它们都是与封建文化、封建文学异质的东西，是在不同程度上可以与传统封建文化相抗衡的东西。

对外国思想学说的吸收，情况也有类于此。达尔文、斯宾塞的进化论学说，都程度不同地存在着优胜劣败、弱肉强食的成分，这早在严复介绍它们时就对之进行了修正，因为当时为帝国主义刀下俎的中华民族的先进人士，是绝对不可能接受听任帝国主义宰割的理论命题的。进化论学说之所以得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参加者的普遍一致的赞同，主要原因在于它是一个讲变化发展的学说。我们不能低估进化论学说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巨大影响作用，讲变化讲发展是一切革新者的基本精神支柱，进化论学说起到了这个精神支柱的作用。至于社会将如何发展变化，那是在首先承认了发展变化的必要性以后所要解决的问题。尼采学说是主张恢复奴隶制度的，是诋毁仇恨妇女的，恐怕没有一个介绍尼采学说的新文化运动参加者赞同并宣扬它的这两个内容。反对封建等级制、主张男女平等的文学革新者，无论如何是不可能接受它的这类主张的。尼采学说之被他们所利用，归根到底仅仅因为尼采是基督教奴隶道德的形式上的攻击者，他的“重新估价一切”的口号满足了当时革新者重新估价中国封建时代的文化道德学术的愿望和要求，陷于封建思想汪洋大海包围中的少数觉醒了的知识分子，对尼采的个性主义也有着一定程度的同感……

当时新文化运动的建设者们，不可能对西方各种思想学说都有一个恰如其分的科学评价，他们的目的不是研究西方的思想学说，我们也不能以西方文化史的研究学者的标准要求他们。对他们重要的只有一点，即是要破除中国传统封建文化的社会影响。而从这个主要意义上，他们是有一个根本的取舍标准的，是不能笼统地称之为“兼收并蓄”的。更为重要的是，正是在这种表面似乎“兼收并蓄”的情势中，在广泛吸收外国文化的基础上，马克思主义被介绍进了中国。历史不是直线发展的，我们也不能要求它只走直线。假若当时的新文化运动没有一种“兼收并蓄”的勇气，马克思主义较之任何其它学说都更少被输入的可能，因为它不但不被大量封建卫道者们所赞同，甚至也不为当时大多数的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所认识。对外国文化取舍标准的任何进一步的“严格化”和“狭窄化”，都将使马克思主义学说得不到入境许可证。淘金者首先要取沙，无沙便无金，所以马克思主义学说的输入，直接标志着“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对外国文化、外国文学的总体上的正确态度。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自从“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在整理和研究中国古代文化遗产上取得最卓越成就的，不是那些以阐扬民族固有文化为标榜的复古主义者，而是那些高张着反对封建传统旗帜的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和参加者。鲁迅、郭沫若、茅盾、郑振铎、闻一多以及在一定程度上的胡适等人，都为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做出了程度不等的贡献。鲁迅在“五四”时期撰写的《中国小说史略》，不仅是中国第一部小说专史，而且至今是水平最高的一部中国小说史。这里的道理是明显的，越是与中国传统的封建文化实现了思想决裂的人们，越是在与世界文化的广泛联系中获得了新的文学观念的人们，便越能有效地清理和研究中国古代的文化遗产，越能在封建意识形态的缘络网罟中挖掘出它的民主性的果肉。我们完全可以说，没有“五四”新文化运动，没

有“五四”时期与世界文化建立起来的广泛的联系，就没有中国历代小说、历代戏剧的价值再发现，就没有古典巨著《红楼梦》的价值再发现，也没有全部中国古代文化的重新清理和研究。事实证明，“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传统文化的“否定”，带来的是对它的在新的意义上的“肯定”，并且只有通过“否定”才会取得这种“肯定”。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

中国现代文学一经建立，文学的民族性的问题便发生了。但我们常常把民族性的概念同接受外国文学的影响简单地、形而上学地对立起来，似乎越是与外国文学没有任何联系、越是与中国古代文学形式完全相同的作品便越是具有民族性的东西。我们曾否想到，对民族性的这种理解将带来什么后果呢？它将带来对整个中国现代文学的否定，带来对“五四”文学革新的否定。在这种理解下，民族性就不再是发展民族文学的口号，而会变成一个复古主义的口号。事实上，民族性是一个发展着的概念，它不能只是古代民族形式的简单重复，也与文学的大众化不是一个等同的概念。意大利文艺复兴的艺术大师们的作品固然具有鲜明的本民族的民族性，那些游学于意大利、向这些大师们学习而创作出了杰出艺术作品的欧洲其它各国的艺术家们，也都具有鲜明的本民族的民族性；列夫·托尔斯泰为俄国农民编写的民间故事具有鲜明的民族性特征，他的《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也不乏民族性的特征。再者，我们也不能把民族化与个性化对立起来，恰恰相反，文学的个性化不但不会损害文学的民族化，反而是达到民族化的必要前提和根本途径，因为个性一定是带有民族性特征的个性，失去了个性也便失去了文学，更难以再谈文学的民族性。所以拜伦、狄更斯、莎士比亚的作品各不相同，但却都是带有英国民族性的东西。更有甚者，我们也不能用民族性代替思想性，我们可以说杜甫作品的思想性高于李商隐，但却不能说李商隐的作品不具有民族性的特征。只要我们划清了

以上界限，我们便会看到，“五四”文学革新带来的不是民族性的丧失，而是民族性的加强。它带来了中国文学的新生机，带来了文学反映、表现中国现代现实生活和思想感情的更广阔的途径，带来了文学的个性化，同时也意味着带来了中国文学民族性的加强。假若说《阿Q正传》无比生动丰富地反映了中国的社会现实，假若说它的艺术形式很好地服务了它的民族内容的表现，我们有什么理由认为它的民族性特征反而不如一部平庸的、思想和艺术上没有多大特色的章回小说呢？有什么理由认为它的形式便不是民族的形式呢？郭沫若的《女神》是有些瑕疵的，但从总体上则是一部杰出的现代诗作，我们只要承认它是中华民族精神的表征，只要承认它的诗形促进了而不是削弱了它的思想感情的表现，我们就没有理由认为它不是民族文学的新的典范，就没有理由认为它的民族性反而不如郭沫若那些没有取得多大艺术成就的诗作，也没有理由认为它的形式就不属于民族的新形式。这里还有一个文学新形式的输入问题。文学希求着多样化，凡是外来形式取得了表现民族生活的职能的，我们就不能认为这种形式仍然只是外国的东西而并非民族的东西。这里不但有这种形式适应表现民族生活的问题，而且也有一个接受民族的读者、观众习惯它、理解它的过程。鲁迅、周作人首次以忠于原著的形式翻译的外国短篇小说集《域外小说集》，当时只卖出二十套，但这并非说外国短篇小说的结构形式不合国情，不能成为民族形式，现在谁也不把在全国各地报刊上发表的大量短篇小说看做非民族性的东西了。我们常常把“五四”时期的话剧做为非民族化的典型例证，但几十年来，话剧一面适应着中华民族的欣赏习惯，而更多地则是中华民族习惯着话剧这种戏剧品种，它得到了缓慢但却持续的发展，丰富了民族戏剧的品种和艺术表现力，扩大了反映生活的广度。芭蕾舞、交响乐、油画都属于这种情况，而电影则迅速地发展为全国人民的第一艺术需要。所以，“五四”及其以后外国文学艺术